

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敦煌,拥有数不尽的文化瑰宝,但多年来敦煌文化一直缺乏顶层设计,更没有一个专业团队来做创意开发。不过,这一切正在改变。敦煌文旅集团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敦煌文旅”)和北京艺有道工业设计公司(以下简称“艺有道”)携手合作,开始了敦煌文化的IP重塑之旅。

石榴裙伞、三兔腕表、骆驼鞋……

推陈出新 设计师重塑敦煌文化IP

□□ 本报记者 刘妮丽

敦煌文化开发陷入困局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个沙漠戈壁中的绿洲。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有月氏、匈奴等游牧民族在此活动。这块土地见证了汉武帝的开疆拓土、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西部大开发”。

敦煌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中东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再后来,佛教在敦煌兴盛,从莫高窟开凿兴建直至藏经洞的发现,敦煌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之一,代表了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中国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

莫高窟现存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藏经洞是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的一间密室,里面保存有公元5世纪至11世纪初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文物5万余件。敦煌也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地。

敦煌文旅想邀请全国乃至全球的设计师和顶级设计公司,一起来设计敦煌、研究敦煌,为敦煌提供产品、模式、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把敦煌文化打造成品牌标杆,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旗帜。

“作为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我们希望敦煌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得以复制和传播,实现敦煌文化的元素化、产品化、体系化、品牌化、国际化,在这个过程中,还会资本化、证券化、平台化,一直持续发展下去。”刘霞霞说。



设计师提取敦煌文化特定的DNA,并设计出极具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

“我们成立了敦煌设计中心,计划将敦煌文化演化成为各类产品,如首饰、服装、配饰等。希望通过产品将敦煌从古到今的美一直传递下去,将敦煌元素变成可穿戴在身上的产品。我们需要热爱敦煌文化、具有时尚设计经验、了解首饰类产品工艺、对敦煌文化情有独钟的设计师,设计出简洁化、专属化、时尚化但不失庄重的文化产品。”刘霞霞表示。

用户画像 寻找核心DNA

经过多次商洽,敦煌文旅和艺有道达成了合作。艺有道的创始人邱丰顺是一名台湾设计师,16年前,邱丰顺就从台湾来到大陆工作。此前,他在飞利浦集团工作过5年,当时飞利浦拥有600名设计师、80多种设计方法。邱丰顺引用其中的5种设计方法用于敦煌文化的开发设计。

在邱丰顺看来,掌握设计方法是打开敦煌文化IP的金钥匙。

在IP解构中,首先要累积创意库,学会构建用户画像。所谓构建用户画像,就是设计师要了解设计的产品卖给谁、怎么用。比如,一款产品通常会有不同层级的使用者,如Hello Kitty的用户跨度从几岁的小女孩到五六十岁的女性,构建用户画像,定位一定要精准,要跟用户的年龄层次对应。再如,一款产品定位为旅游商品还是收藏品,价格迥异,人们到敦煌是买旅游商品而不是收藏品,因此,价格定位不宜太高。

除了用户画像,还要找到产品本身的DNA。所有IP都有自己的DNA,如迪士尼、漫威、故宫,要设计出符合IP本身DNA的产品,还要加上新材料、新工艺。当然,IP不能凭空创造,要有相关元素跟IP产生连接。“敦煌有它特定的DNA,敦煌有非常多的

地理景观、人文元素可以提取,它创作的元素特别丰富,我们从敦煌文化中提取元素,可以设计出至少1000种产品。”邱丰顺表示。

抽丝剥茧 设计师重塑超级IP

在邱丰顺看来,每一个中国文字都可以成为一个符号,变成一个设计场景。“康熙字典里有几万个字,设计师可以据此做出几个作品。有时我都觉得自己笨,只盯着西方设计去模仿,其实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都不完。”

根据壁画中的形象,邱丰顺的团队设计出了同款挎包。“没想到古人竟然这么时尚,我们把敦煌壁画中古人的包加上2016年的流行元素,重新赋予它材料、色彩以及现代感,做出来的挎包产品非常漂亮。”邱丰顺感叹,“中

国的设计师何其幸运,敦煌莫高窟累积了中国各朝各代优秀艺术家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图像、色彩、文字。”

另外,设计师还要学会抽象化产品。所谓抽象化,比如一个人在打太极,抽象化以后,可以想象成是张三丰在打太极。邱丰顺说:“石榴裙是唐朝一种流行服饰,李白有诗曰‘移舟木兰棹,醒酒石榴裙’,‘拜倒在石榴裙下’表现出古代男子对女性的倾倒之情。有时,我们跟国际友人讲中国的易经、风水,他会立马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我们做了一把伞,就叫‘拜倒石榴裙下’。这也是一种抽象化方式。”

三兔藻井图位于敦煌莫高窟第407窟,绘制于公元6世纪的中国隋代,最早出现于敦煌的藻井之上。莲花式井心中呈现出3只兔子共用3只连在一起的耳朵,在往同一个方向奔跑着,彼此追逐着,却又永远追不到对方的

图景。三兔图不仅存在于佛教的艺术中,在时间和空间相距这么遥远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曾采用这个图像。“三只兔子代表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我们用这个引喻把它们放在手表里,男朋友送给女朋友手表,就寓意你要爱我三世。”邱丰顺说。

“再如,敦煌壁画里面有很多动物,我们搜集了敦煌壁画里跟动物有关的图案,抽象化以后,成为敦煌特有的壁画动物。把它抽象化以后,可以将敦煌特有的壁画动物都做成橡皮筋。敦煌是当时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骆驼非常多,骆驼也因此成为设计的一个重点。我们设计了骆驼鞋,穿上就像骆驼的脚一样,这些东西都是抽象化。”邱丰顺解释,敦煌里面有很多的动物,其准备出一系列以动物为主的图,如果你买了这些书,就看见你的书架上有好几只动物在那儿奔跑,形成一个“敦煌动物园”。

“我们也会做一些全新的创造,比如第320窟的飞天画是唐代飞天代表作之一,飞天的四周彩云飘浮、香花飘落,既表现飞天向佛陀作供养,又表现俄国天堂的自由欢乐。我们解构的莫高窟320窟,因为图腾很特殊,我们会把这个图腾抽离出来重新解构和组合,再把它制造出一个新的图腾出来。”邱丰顺表示。

设计元素的提取能让消费者与IP产生连接,从而打造成超级IP。邱丰顺认为:“敦煌的游客每年达百万人次,而且在逐年递增。然而敦煌所有的餐厅里,没有一家餐厅的餐具有敦煌特色,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我觉得蛮可惜,设计师还有很多发挥空间,可以把图案重新解构,包括它的色彩、形象等各方面重新解构,用设计的力量,让文创产品成为敦煌文化IP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意学堂

城市规划也要坚守中国人文传统

未来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一定要融合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优秀规划传统,并结合新的时代需求和国际规划成就进行整体创造,从历史智慧中寻找中国城市规划的文化根基,探寻中国历代规划先贤始终坚守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念,使我们在激荡的城市规划变革之中,始终守住中国人文传统。

□□ 王树声

几乎每一个古代城市都有自己的“八景”“十景”或“十二景”,这已成为中国城市风景营造的一个传统。“八景”的景致涉及山水、古迹、标志建筑、自然景观等不同对象,有远眺型、登临型、凭吊型、纪念型、民俗性等不同的内涵,以及不同时节和气象条件下的特殊景象。

中国城市规划有重视风景营造的传统,会以风景的思维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因此,城市也就成为风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的规

划与建设中,对风景的发掘不仅是在经济富裕地方,就是贫弱地区也有一样的追求。

从城市规划来看,“八景”传统中有两方面对当今有很大的启示。一是,“八景”传统让中国城市始终有“风景意识”和“风景责任”,能够自觉对城市及周边环境进行风景发掘、营造、保护和提升,形成多样化的地方风景。

尽管不同地方的“八景”也有一些雷同之处,有的名不副实,但毕竟这个传统使得我们以最简便和通俗易懂的模式,让全社会有一种“风景自觉”的意识,能够把本地区最富有特色的景致发掘出来,保证了即使在风景禀赋一般的地区也能有一个基本的风景基准。

二是,“八景”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或因战争而毁灭,或因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消亡,或因自然灾害而损坏,也可能因人物的崛起而勃兴。同一地区在不同时期“八景”的内容也会有所变化和调整。因此,“八景”并不是一个教条,而是一个风景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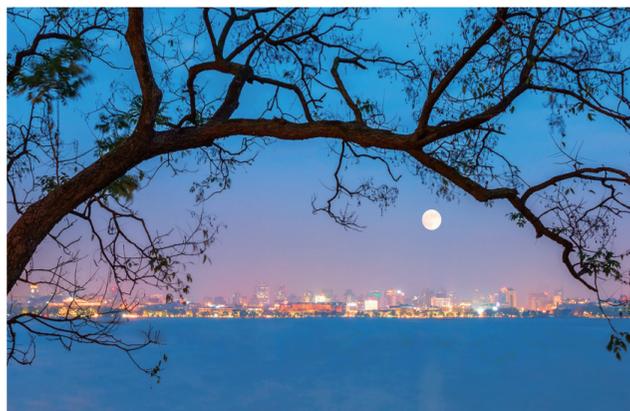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对于“八景”的记录和表达方式也颇有启示。城市除了八景图、八景诗之外,一些城图上也标清了“八景”的名称和方位。当然,这不是

一种城市规划图,也不是风景规划图,它是中国人表达城市人居环境的一种习惯、智慧和经验。它启发我们,城市规划应该有一种风景意识,城市规划图应该有一种表达地区风景的新手段,让我们更好地把握地方风景营造的关键点。

中国历史上虽然讲“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也确实也出现了因人的活动影响乃至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记载中,中国古代城市尤其关注种树、水

的防与用的问题,并将这些事从人文角度去提升和传承,成为一种人文精神,注入到地方传统中去。

不过,这一切的关键还是在人。人有一种整体观,一种“不与水争地”和“顺自然之势”的态度,还要有一种整体观,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然,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往往还有一种家园意识和人文精神,把植被、水利和文化、风景联系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生态环境文化。



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历史上古代城市规划形成了“文人+匠人”营造模式。中国城市是“文人”与“匠人”共同创造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可谓村村有巧匠,县县有文人,共同建构了一个爱乡土、爱家乡的“乡土班底”,支撑了地方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中国历史上规划人物可谓星斗荟萃,代有贤哲。隋代宇文恺当然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誉之为“旷世奇才”。他集规划、建筑、风景、技术于一身,是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位集大成者。

隋以后,中国依然有宇文恺式的人物出现,如刘秉忠、“样式雷”等,但从中国后世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来看,特别是地方城市规划,形成了一个新的规划模式,即“文人+匠人”的营造模式。

中国文化中对人居环境的境界追求决定了文人在此期间的重要地位,每一个地方都有一批文人,他们传承中华文化,守护地方精神,把对中华文化的责任、地方乡土的热爱和自己特有的修养与才情注入到城市空间环境的营造之中,他们可谓中国城市规划的传承人、地方精神的守护人、城市艺术秩序的创造者。各地关于文人参与

城市规划建设者的典型案例非常之多,特别是一些循吏本身就是文人,例如柳宗元、苏轼等,他们对城市规划卓有贡献。此外,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人群体,他们都是地方规划的骨干。

与文人一样,每一个地方也都有技术熟练的匠人群体,他们往往支撑着一方的工程技术任务,形成独特的地方工程经验。文人在谋划,经营格局,匠师则是负责具体的营建。建造往往是一方重要的事情,对匠人的选择也是十分慎重的。匠人群体不仅包括熟悉具体技术的普通匠人,如柳宗元在《梓人传》中所谓的“执用之工”,尤其是指“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即具有工程经验且能具体创作的建筑师。

由苏东坡式的文人和鲁班式的匠人共同所形成了一个“文人+匠人”式的“乡土班底”,这是中国城市规划独特之处。丰富多彩的地方城市及其精妙绝伦的建筑都是出自他们之手,工程与人文、技术与艺术的有机融合,可谓是中国式城市营造的大智慧。

(节选自《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有删减,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